

重大疫情之下隔离措施的法律问题研究

杨曙光 侯 燕

摘 要 | 2020 年春节之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各领域全球化的基础上丰富了“传染全球化”，为遏制病毒传播，中国各省市根据各地实际疫情，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隔离管控措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传染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非常时期”依法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符合自由与秩序关系、行政法比例原则的理论要求，能够实现疫情防控、人权保护、公权力运行等多个目的。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应急权责清单化、开展权威法治教育、严格依照比例原则规范执法以及切实保障好民生物质基础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应急性隔离。

关键词 | 疫情防控；隔离；人权；比例原则

作者简介 | 杨曙光，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侯燕，烟台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率最快、蔓延地域最广、治理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强传染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通过采取隔离措施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行政执法应急防控方式。隔离措施主要是特定时期内对公民的限制或者区域的封锁，以人权的保障相对于国家权力的执行而相对弱化为表象，引发防疫隔离践踏人权的争议。疫情期间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到全体人民的身体健康与国家的疫情防控成果，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研究应对重大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隔离措施十分必要。

一、疫情防控隔离措施综述

伴随着 2020 年春节一起到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成为中国民众乃至全球舆论不容忽视、长期关注的社会焦点。为应对传染性和破坏力均极强的新冠肺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采取了及时有效的防控隔离措施：2020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钟开始，武汉“封城”，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疫情的封城防控战；至 2020 年 1 月 29 日，中国 31 个省市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暂停省市际客运、航班的切断交通

式隔离举措,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涉及人数最多的疫情防控战。^[1]

(一) 防疫隔离措施的种类

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机构为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对公民所采取的不同程度的出行限制或者对区域展开的不同级别的封锁都可以称之为“隔离”。根据行为主体、针对对象、行为方式牵涉范围的不同,通过详细的梳理,可以将“隔离”归纳总结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是协助医疗机构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治疗或者医学观察。早发现、早隔离是疫情防治的两个要害,针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是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2]所采取的专业医学治疗,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隔离措施,侧重于对已感染者的及时救治以及精准有效控制高危传染源。

二是跨国、省、市流动后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

离观察14天。这种隔离主要包括疫情初期未采取限制措施前的国内人员流动、世界各国疫情暴发后出现的人员归国流动、疫情减轻后国内各省市逐渐复工出现的返工人员流动三种情形,对于限缩传播范围、防止区域性疫情复发起着关键性作用。

三是政府对特定区域或场所进行隔离。这种情形针对已经发生新冠肺炎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主要体现对已经存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患者所在小区、单位、工厂等特定场所的封锁,并且要做好封锁后的全面消毒处理措施。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3]的规定,特定场所或者区域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

四是疫情特别严重地区采取的“封城式隔离”。以湖北省各地级市为例,是当地政府机构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4]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5]采取的封锁疫区的强制性措施。

[1] 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5月第73卷第3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医疗机构对本单位内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消毒和无害化处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三条:

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国务院可以决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疫区内采取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措施,并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

疫区封锁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三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

这种隔离涉及地域广、人数多，相应的执法程序复杂，需要报请国务院决定，并且需要调动全国人力物力做好隔离后续的保障工作。

五是因交通等原因被动隔离在老家的隔离措施。这种情形主要是指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市的基层地区所采取的所谓“封村”“封路”类交通管制措施，居民、村民等人员流动存在交通上的客观条件不具备，从而达到区域性隔离的目的。^[1]

（二）防疫隔离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简析

1. 非常措施存在非常问题

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未明确疫情防控部署之时，新冠肺炎对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给政府机构及人民群众均带来巨大的恐慌，导致在疫情防控隔离措施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不规范现象。铁链锁门、木板封门、焊死大门、24小时看守等是疫情初期部分地区主要针对武汉返乡人员采取的“花式隔离”，以上措施虽然起到了居家隔离的效果，但是却明显超出了采取措施的正常、法定程度。封死家门、24小时看守，究其行为性质应属行政强制措施中的“限制人身自由”，而非疫情防控隔离。此外，在行为执行过程中也未遵循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未出示执法身份证明证件，未做笔录，无盖章签名，被执行人几乎没有提出异议机会等等。^[2]

在国内疫情得以控制、情况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各地均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展了复工复产的有效行动，而复工潮带来的人员流动又引发了新一轮隔离措施的开展。复工复产的疫情防控工作主要依靠“跨省市流动后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离14天，无情况正式复工”的隔离措施，再加之复工前“因交通等原因被动隔离在家”的隔离措施，这就相当于复工人员连续接受两次不同类型的隔离措施，“两头隔离”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的严格开展，但是加剧了复工人员的复工成本、企业复产成本与国家恢复成本。在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的巨大危害性之下，如何把握隔离措施的实施力度，实现共同战“疫”与全面小康的协调稳步推进，也是隔离措施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2. 非常原因引发非常问题

隔离措施作为防控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最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之一，在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以上问题，既有民众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事实上的不可避免。主观原因之一是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不明确人权是包含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权利，而生命健康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仅仅关注疫情防控期间的国家公权力的运行相较公民人权的保护而言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这一表象。二是民众在疫情期间普遍存在恐慌心理，尤其疫情暴发初期，来势汹汹的传染性疫情极大程度地摧垮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再加之缺乏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分析与应对疗法，民众难免“病急乱投医”。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政府机构采取的一系列隔离措施的确给民众出行、社会运行带来不便；第二，疫情期间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并对极少数执法不规范现象夸张、渲染传播，恶意加重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非常时期，非常措施的非常依据

非常时期的一系列非常措施的确给民众出行、社会运行带来极大的不便，但是戴口罩、居家隔离等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保障公共安全。隔离措施是政府机构的严格执法行为，是符合实际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有法律保障的合法行为。

（一）隔离措施的法理学依据

1. 防疫期间公权力运行与公民人权保障的协调

我国宪法学将人权界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尊重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要以明确人权的

[1] 赵金霞、徐丽媛、念芳芹：《从劳动关系视角出发对疫情期间“隔离”的理解与适用解析》，http://www.winlawfirm.com/CN/news_content.aspx?PageCheck=NoLeft_News&Lan=CN&newsKeyID=00000000000000002，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2月14日。

[2] 张灿灿：《封死居家隔离人员家门于法无据》，《检察日报》2020年2月10日第4版。

内涵为前提,人权是包含生命、健康、平等、自由、劳动、休息、受教育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权利^[1],生命健康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权内涵的丰富性也就决定了在尊重、保障、实现人权时,可能会遇到内在因素相冲突,难以同时实现的情况。在我国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包括隔离措施在内的应急防控措施正是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作为行为目的,也就是以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为目的。有关疫情防控的国家公权力的运行相较公民人权的保护而言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这是未明确人权内涵时所看到的表象;相反,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为降低患病率、死亡率所实施的公权力运行正是把保障人权放在首要位置,处处彰显人权保障。^[2]而且,人权越要真正地、充分地得到尊重和保障,就越需要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地实施疫情防控措施。

2. 防疫期间公共安全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疫情防控期间,隔离措施的实施是出于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但是采取隔离措施又明显地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及隐私权等权益构成一定侵犯,能否权衡好两者关系将直接关系到疫情防控措施的正当与否。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理念是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石,行政机关既要有效行使权力又要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在制度设置上必须基于一种公共安全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理念,使极易冲突的两者关系得以协调。行政机关采取隔离措施实际上是通过限制少部分公民的少部分权益而保护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无论是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还是对疫情防控的预防和控制,目的终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通常,我们认为,尽管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侵犯了公民个人权利,但在宏观与大局意义上却达到了公共秩序的维护或公共利益的保护,为公民提供了稳定有序的公共环境,实现了社会最多数人的人权保障。在这一意义上,公民个人权利与公共秩序的适当妥协赋予了行政机关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正当性。也即,公民有必要在一定限度内接受行政机关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干预或约束个人权利,以获取更大范围内的

自由与权利。

3. 从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角度分析隔离措施的实施

行政机关采取行政措施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与人权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损害个人权利的情形确实是难以避免的。衡量两者之后,在实现秩序价值的同时,在一定限度范围内实现公民自由,这是法治国家行政机关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法理基础,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更是公共秩序的维护与人权的保障之间的平衡。因此,行政机关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涉及了双方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与秩序在法理学中时常同时出现,二者对立统一,既有冲突也可以相对和谐。自由是每个个体都应享有的权利,但同时自由也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的权利时都要同时兼顾着他人的自由权利。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行动的绝对自由等于权利的绝对受侵害,可容忍限度内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权利,自由的实现依赖于秩序的建立,秩序中的自由才是真正可实现的自由。同时秩序也约束着自由,使自由徜徉在合法领域内而不至于被滥用;但是如果秩序没有原则的对个人的自由进行干涉、无限限缩自由的范围,整个社会都会处于极度受限的不自由状态,这种秩序也会因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与客观需要而难以持久。^[3]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行政机关采取的符合现实要求的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所造成的影响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个人的权利造成限制或侵犯,但是在更深层次上

[1] 何志鹏:《保障生命安全的人权更扎实可靠》,《环球时报》2020年2月26日第15版。

[2] 张永和:《中国疫情防控彰显人权保障》,《学习时报》2020年3月20日第1版。

[3] 杨曙光:《论警察盘查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协调——以美国特里拍身规则为视角》,《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却达到公共秩序的维护。

（二）隔离措施的行政法依据——必要性原则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依据执法行为适用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例行的执法行为和特殊应急的执法行为。一般例行的执法行为的特点是，相对人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进行正常的管理活动，在相对人没有违法的情况下，并不限制其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在相对人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依法进行制裁。如行政机关进行户口登记、宾馆消防监督、车辆年检等正常的行政履职行为。特殊应急的执法行为的特点是，采取这种行为必须是因特殊紧急情况的出现，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定职责要求行政机关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如消防队员强行拆除民房以防止火灾蔓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执法行为可超出一般法律的普遍禁止性规定，而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或行政法原则，包括隔离措施在内的某些疫情防控的行政行为就属于特殊应急的执法行为，这类行为体现了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必要性原则。拉丁法谚“Necessitas quod coit, defendit.”意为“‘必要’可作为辩护”^[1]，指不得不从事的行为是正当的行为，常用于行政司法官执行公务的行为，疫情防控这一非常时期，作为国家公权力表现形式的隔离措施即具备“必要”这一条件要素。

（三）隔离措施的现行法律依据

于法有据才能依法有序。我国已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针对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分的法制保障。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地方的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了各自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实施。我国各地所实际采取的不同类型的隔离措施均是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于法有据，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举措”而非“软手段”。任何不遵守隔离规定、破坏隔离秩序的行为所面临的是国家强制力的严惩，以浙江省首例宣判的居家隔离人员违反居家隔离规定、妨害公务案件^[2]为例，“违反隔离规

定获刑”是给全国人民在疫情防控期间上的一堂实实在在的法治教育课。

三、防疫隔离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一）比例原则是隔离措施依法开展的“标尺”

比例原则是行政机关执行行政行为，尤其在执行行政强制行为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其一，妥当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而采取的依法行政行为。其二，必要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实现行政目的必须采取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行为方式。其三，相称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所要实现的法定目的显失均衡。隔离措施作为具有明显强制性的行为方式，在决定是否满足使用条件以及把握使用限度的时候需要严格遵循比例原则。正如拉丁法谚所说“Necessitas est lex temporis et loci.”意为“必要就是法律，但应依时间和地点而定”，即该特殊应急的行为只能给相对方造成最小的侵害，所采取的措施应当与所要实现的合法目的合乎比例。

1. 隔离程度遵循相称性原则

主体不合格、程序不合法的“花式隔离”是在“配合做好防疫隔离”主张下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实际侵犯，行政目的与现实侵害明显失衡，违反了相称性原则。在实际处理异地返乡人员、密切接触者等具备感染危险性人群的隔离措施时，

[1] 《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53页。

[2]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一批）》案例三：2020年2月2日上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巡查时，发现居家隔离人员王某某有违反居家隔离规定、擅自外出的行为，遂对其进行劝导，要求其遵守居家隔离规定，但王某某不予配合，并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旧馆派出所社区民警朱某某到场协助开展劝导工作，王某某仍不配合，并用手攻击朱某某，抓伤朱某某脸部、颈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该案，以违反居家隔离规定、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

一是要注意行为方式,可以采取“心理教育+精神引导+行为强制”的步骤化隔离,通过软手段实现硬治理,保证非常时期的社会稳定;二是要严格依法执行,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规则的引导下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发挥法律的应急性功能,依法维护社会秩序。

2. 隔离方式遵循必要性原则

2020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中央在防控疫情与发展经济的协调关系中明确提出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面对国内疫情逐渐好转态势所带来的复工复产、人员流动现象,可以通过“点对点运送”配合全面消毒,实现人员的无接触流动,避免感染的同时降低时间成本;或者依法采取“区别式隔离”^[1],根据返工人员的来源调整隔离实施力度,避免隔离措施的重复开展,确保疫情防控中行政执法工作的必要性原则。

(二) 应急权责清单化是隔离措施有序开展“保证书”

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对政府建设的要求,以及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执法原则,行政执法的开展要严格依照政府部门公开的权力清单,以确定各级行政机关的政府职能、职责权限、管理流程、法律依据、监督方式等事项。通过浏览各级政府部门公开的权力清单,当前行政主体,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清单在形式上按照行政行为的种类进行细化,根据职权对应事项名称,并对事项进行编码,以实现权力的无重叠,科学分权、便于更好地进行权力监督;此外,相应事项的权力均有注明立法来源,既保证了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又能够避免不同位阶行政规范性文件协同一致。^[2]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及时、明确的权力划分与责任承担是有序执法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应急方案的指导下,制定及时、明确、科学的应急权责清单是保障执法效率与效果的基础与前提。

(三) 权威教育是隔离措施稳步开展的“定心丸”

不管是本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我国之前发生过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太湖蓝藻水

污染”事件“非典”“甲型H1N1”“SARS”流感病毒事件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可以从中看到我国民众对突发事件的非理智应对。尤其是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时代,真真假假、形形色色的消息传播成本低、社会危害大的趋势已经形成,谣言传播者利用民众的畏惧心理,大肆散播消息,制造社会恐慌。

官方采用传统电视广播的方式定期向公众开展普法教育、思政教育、防疫教育大讲堂是进行宣传科学防疫知识、辟谣止谣、公开政府防疫举措的高效方式。在突发卫生事件爆发后,及时的思政教育既能够减缓公众自身的恐惧感,避免不良风气“乘虚而入”,进而稳定社会秩序;以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国大学生思政课为例,全国统一的线上思政教育对于大学生坚定战“疫”意识、提升爱国思想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专业的法治教育既能够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又能够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与预防作用;就隔离措施而言,在公众了解隔离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之后,积极主动的配合会更加有利于隔离措施的顺利开展。开展权威思政、法治、防疫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信息公开的真实性,一些地方政府关注重大疫情信息的社会影响,担心这些信息的发布会导致公众过度忧虑。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是模棱两可、有所隐瞒的官方信息不仅会损害政府权威公信力,更会加剧突发公共事件时期社会的不稳定。

(四) 物资保障工作是隔离措施有效开展的“镇定剂”

隔离措施的具体形式主要表现为集中隔离与居家隔离两种,但两种形式都体现了隔离措施的相对封闭性。再加之疫情发生于春节之际,国内

[1]《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做好员工健康管理。各单位要切实掌握员工流动情况,按照当地要求分区分类进行健康管理,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处在隔离期间和入住集体宿舍的员工,应每日进行2次体温检测。及时掌握缺勤人员健康状况。

[2]登录各省市人民政府官网即可查询到政府公开的权力清单,或者是权责清单。

企业普遍处于停产放假状态，物资生产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国内企业职工大多返乡过节，国内劳动力分布与现实需要不匹配，也给疫情防控的物资保障工作增加了难度。本次疫情期间出现的物资匮乏、市民疯抢、物资援助不对口、物资分配不及时、有物资无交通等情形均是政府机构在采取隔离措施后保障工作存在漏洞的具体体现。疫情防控期间，人员的相对封闭隔离需要充足的物资保障作为配套条件，政府机构在全面“战”疫的同时也要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以及日常所需防护用品的居家配备与物流畅通。体现在具体行动上需要进行权力的下放与监管，做到中上层集中调配、监管与基层具体落实、上报相结合，借助基层政府的力量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民用不匮则人心不慌。

（五）互联网技术是隔离措施有序开展“催化剂”

18 世纪末至今掀起的三次科技革命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和巨大的社会进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以电脑、能源、新材料、空间、生物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无不引入科技元素。在本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中，科技革命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互联网技术为疫情通报、信息公开等行政执法提供了便捷；大数据为疫情的精准分析、预测提供了技术支持；生物技术则加快了病毒的防治与疫苗的研发，使得彻底控制疫情成为可能。

基于隔离期间人员流动的不便性，行政机构实

施隔离措施时也要注入互联网等高科技因素；以隔离测温、确定人员流向、把控隔离限度为例：对于疫情严重的被隔离小区，可以通过无人机进行远红外线测温，尽可能实现人与人零接触；对于隐瞒武汉返乡事实、境外回国事实的感染危险性人群，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予以确定，及时切断病毒传播的可能性途径；对于采取大范围封锁的疫区而言，隔离措施为极其严重疫情所必需，但是长时间的封锁甚至封城给城市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大数据分析有助于疫区政策的及时、科学革新。在类似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应该引入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完善社会治理措施，同时也要做好互联网的监管、清洁工作。

四、结语

重大突发传染性事件暴发后，迅速、科学、合法、有效的政府治理方案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更需要非常措施于法有据、于人有情。对于强传染性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依法隔离是重要行政治理方式，符合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安全、运行国家公权力三者相协调的要求，符合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在执行程序方面也有明确现行法律依据。此外，通过强化隔离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亮点，弥补暴露出来的漏洞，有利于包括隔离措施在内的应对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方式朝着合法合理化、高效智能化方向迈进。